

葛劍雄◎
編

珍藏版

新史學叢書
譚其驤
日記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 廣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谭其骧日记/葛剑雄编.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3. 4

(新史学丛书系列)

ISBN 978 - 7 - 218 - 08607 - 1


I. ①谭… II. ①葛… III. ①谭其骧(1911~1992)—日记
IV. ①K825. 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37695 号

Tan qi xiang ri ji

谭其骧日记

葛剑雄 编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曾莹

选题策划: 余小华 肖风华

责任编辑: 肖风华 古海阳

封面设计: 张竹媛

责任技编: 周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广州市穗彩彩印厂

书号: ISBN 978 - 7 - 218 - 08607 - 1

开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张: 17.375 插页: 2 字数: 300 千

版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 - 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0604 83791487 邮购: (020) 83781421

总序

读者看到“新史学”三字，也许会联想到20世纪初梁启超发动的那场史学革命。其实我们并没有梁启超那样的雄心，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困惑，也和他那时大不相同了。昔日梁启超们痛感旧史等同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而不载”，所以他主张要写“新史学”。今天，大概已经很少有人以为历史只与帝王将相有关了吧？这也是梁启超们努力的结果。

我非史学界中人，但雅好读史，对史学研究的现状，觉得有这样几个毛病：一是对待史料，常凭个人好恶和口味而取舍。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每置大量“不利”的史料于不顾，却把孤证当宝贝津津乐道。二是回避真问题。1949年以来，连篇累牍讨论的关于奴隶制和封建制分期、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关于农民起义性质等等问题，几乎都成了毫无意义的废话。反之，对日本侵华战争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罪行，却很少写成历史。到了和日本右翼较量时，历史学给我们准备的证词却是令人沮丧的单薄，拿不出扎实的具有专业水准的实证研究。三是忽略了宏大背景中小人物真实的生活和真切的情感。就像前辈史学家所说，哪一年发生了什么战争，哪一年哪个大臣受到了什么赏赐，史籍上都清清楚楚，而当时老百姓用什么餐具吃饭，婚娶的风俗是什么样的，寻绎却十分困难。在近现代史研究中，这个毛病更为凸显，小人物的史迹越来越被一个个宏大的浪潮所淹没。至于为时风所侵袭，或躲躲闪闪，不敢直面历史，或哗众取宠，制造“史学泡沫”，或急功近利，专以“戏说”为事，就更是等而下之的通病了。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不同于象牙塔里的高头讲章,要让普通读者有阅读的兴味;要讨论一些真问题,虽不必让所有读者都同意你的看法和说法,但至少要引发他们的思考;当然,更不能打着史学的旗号,兜售私货。要做到这些,我得承认,我的学养是不够的,但心是虔诚的,算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由于个人的兴趣,我更喜欢那些以史料说话的书,因为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都可能过时,而以扎实史料说话的书,即便“结论”过时了,但史料也许还会活着——尽管它也必然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而且不能不受记录人思想感情、方法手段的影响。还有,我是本丛书的策划人,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我个人喜好的影响,这些都是要向读者说明的。

钱潮汹涌,书斋寂寞。当下,有真学问的史家也许不少,可要在现有条件下,推出一套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对当下一些真问题有所回应的史学书却并不容易。组来的书稿,本来有十余部,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有的只能暂且搁置。恰好手头另有一套文史丛书,和这个选题互有交叉,于是将二者合而为一,这套书也就成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丛书,而是一套比较开放的丛书——无论何种写法,无论何种体裁,只要有新的材料,或是有新的见识,都拿了进来。鲁滨孙说:“就广义说起来,所有人类自出世以来所想的,或所做的成绩同痕迹,都包括在历史里面。大则可以追述古代民族的兴亡,小则可以描写个人的性情同动作。”据此,说这套“新史学丛书”所反映的是广义的历史,也应该是可以的吧?

几年前编“文史年选”,我在那篇短序里说过:“绝对真实的历史是永远无法获得的。《联共(布)党史》曾被我们奉为圣典,当斯大林走下神坛之后,才知道那并非历史的真实。有人说‘那是用血写成的谎言’,这话确否暂且不论,但它确实只能算是布尔什维克‘斯大林派’的历史。要是站在托洛茨基的立场上看,那当然全是颠倒黑白的。”也许可以这样说,任何历史都是片面的。关键是:我们要学会从片面中感知全面,对历史保持一种温情和敬意,并且要有个基本的底线,即使不能全说真话,但决不说没有根据的假话。

向继东

2008年10月于长沙



了解历史和研究历史都需要文献资料，当事人的日记是其中之一。但并不是所有的日记都能用作史料，因为很多日记所记的并不是实际情况。

本来日记是记给自己看的，留作日后查考，起到备忘和自我修养的作用，青少年或兼做练习写作。一般说来，日记是个人隐私，秘不示人，轻易不会发表，至多只给最亲近的人看若干片断。这样的日记才会记得真实，才能不计功利，无所顾忌，才有史料价值。

但有些日记的功能已经改变了，特别是一些名人、要人的日记，本来就是为了日后发表才记的。或者正确地说，是为了发表才编造的。因为准备发表，作者一般都会尽其所能地记得详略得当，生动可读，有的还反复修改推敲，当作文学作品来创作。胡适的日记据说就是准备发表的。近代以来流行的几种日记多数也是作者为日后或身后发表才记的。前几年，某出版社就曾在年初向几位名人约稿，次年初就推出了他们上一年的日记，有的还颇有销路。

准备发表的日记未必就没有价值，也不是完全不能用作史料。因为日记中固然会涉及一些与个人利害有密切关系或者相当敏感的方面，但必定也有大量不妨实说的实话，或者非实录不足以流传的内容。如前人以日记形式记下的大量游记、行记，基本上都是为发表或传世而记的，但像《徐霞客游记》就有其重大的科学价值和文学地位，古代一些使臣的日记往往也包含着重要的史料。

不过，一些特殊的日记自当别论。如政界人物出于政治目的而编写的日记，假道学家自我标榜、自欺欺人的日记，就千万不能当真，否则就中了他们的圈套。还有一些产生在特殊条件下的“日记”，尽管作者大多是无辜的、不得已的，但除

了可以保存一些样本供后人了解外，其余都只配作废纸处理。记得“文化大革命”中，作为中学教师的我经常要布置学生记“红色日记”，并且要定期收上来检查，挑出一部分来张贴展览。当然这不是我的创造，而是执行上级的指示，是当时形势所然。但那些可怜的学生们只能天天写下满纸的大话、空话、假话，不是欢呼最新指示，就是学习两报一刊社论；不是“斗私批修”，就是豪言壮语；不是好人好事，就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新动向。报上不断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在他们的先进事迹后面总会附上几篇他们的“红色日记”，不管他们文化程度的高低，其中必定有一些富有号召力的“豪言壮语”。

有“红色日记”，就会有“黑色日记”，当时称为“反动日记”或“变天账”。在一次抄家、打砸抢或强迫“自觉上缴”的“革命行动”之后，总有一些“阶级敌人”、“牛鬼蛇神”或审查对象的日记落入“革命群众”手中或“无产阶级专政”下，成为揭发批判的靶子或定罪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对幸存的日记，本人和家属毁之唯恐不及，少数被设法隐藏起来的也未必都能重见天日，而绝大多数原来记日记的人都就此搁笔，或者只能记“红色日记”了。坚持记日记，并且不记假话的人已是凤毛麟角，他们的日记能够保存到今天的当然弥足珍贵了。这样的日记不仅可以作为史料，而且本身就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留下的日记就是如此。

1981年5月我第一次作为先师的助手陪同他外出开会，就发现他每天临睡前都要拿出日记本记日记，以后十一年间都是如此。偶然因病因事没有记下的，他会及时补全。1991年一个夏天的午夜，他是在记完日记后坐在椅子上失去知觉的。而就在他最后一次发病前的几个小时——1991年10月18日凌晨3点，他记了最后一次日记。十几年间，我随先师外出不下数十次，他对我几乎无话不谈，但没有让我看过他的日记，只是说：“我记的都是流水账，以后你可以看。”

先师归道山后，哲嗣德睿先生代表家属，将先师的日记和其他文稿资料交我作为撰写传记的参考。我发现先师的日记是非常宝贵的史料，本着他一贯倡导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精神，我认为这些日记不能只供我一人使用，而应该加以整理发表，使之充分发挥作用，得到了德睿先生的赞同。果然，先师的日记选在《史学理论研究》杂志上分期连载后，就受到了学术界重视，也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兴趣。但这份杂志的发行量有限，很多想看的人还看不到，或者根本不知道，所以我接受安迪兄的建议，将先师的部分日记汇编为书，交付出版，以便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和理解这段历史，研究这段历史。

现存先师的日记，最早的是1946年9月由贵州遵义复员回杭州途中所记的，但只有事后抄录的片断。以后就是1951年10月27日至1952年2月5日参加土改

运动的日记，1955年2月11日至1956年8月22日、1956年10月12日至1957年1月13日在去北京编绘地图和以后历次去北京开会期间的日记，1957年至1964年在上海期间的部分日记，1964年10月1日至1978年1月底的日记（“文革”期间的1968年2月至1969年初仅记片断），而从1979年2月1日至1991年10月17日的日记一天不缺，最为完整。

这次选录的是土改日记（1951年10月27日至1952年2月5日）、京华日记（1955年2月11日至1956年8月22日、1956年10月12日至1957年1月13日）和“文革”日记（1966年5月6日至1972年12月31日），题目是由我加的。

此外，先师还留下了几本笔记，其中在两本笔记中，详细记录了1952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思想改造运动的全过程，包括领导讲话、工作布置、小组会上各人的发言和本人部分发言的要点。我照原文录出，加了一些必要的说明或连接语，题为《虔诚的忏悔——思想改造手记》，编在日记的后面。我认为，这些笔记和日记一样，也是相当可靠的原始资料。

既然先师的日记不是为了发表而记的，在发表时就得尊重他的遗愿，如果有他不愿意发表的内容就不应该发表。我在选录时作了两方面的处理：一是属于个人隐私的家庭琐事，如夫妻关系、子女的婚嫁生育、亲戚来往等。文中凡用省略号的，都是这方面的内容。一是隐去了一些人名，凡是“文革”期间批斗先师和他人的，或在当时做了一些错事的，一般都用□□号代替姓名。对这些人先师生前一直持宽容态度，从不计较他们当年的行为，还是将他们当学生和同事对待，对他们扶植支持不遗余力。他说：“‘文化大革命’的账不能算在他们头上，他们不批斗我，也会有其他人来批斗我。”我相信这样处理是符合他的意愿的。

日记中的圆括号及其中文字是原来有的，方括号中的文字是我注的，主要是姓名或身份的介绍，个别无法辨认和原来就缺的字用□号表示，并加括号说明。

思想改造的笔记与日记不同，所记都是各人在公开场合对同事和学生代表说的话，并不是什么个人隐私。尽管今天看来不乏言过其实，危言耸听，甚至会觉得滑稽可笑，但在当时，人们都会感到相当自然，态度极其虔诚。唯其如此，就更值得后人深思。事情已过去四十五年了，接受改造的教师们多数已经作古，所以除了对健在教师的自我批判隐去姓名外，其他都照原文录出。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我加了一些必要的说明和连接。

葛剑雄

1997年2月4日夜



《谭其骧日记》选编于1997年2月，1998年由文汇出版社出版，现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再版。我在原书的《前言》中曾说明，“我发现先师（谭其骧）的日记是非常宝贵的史料，本着他一贯倡导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精神，我认为这些日记不能只供我一人使用，而应该加以整理发表，使之充分发挥作用”。将此书列为“新史学丛书”，无疑是合适的。

《日记》出版后，就有友人问我，既然先师晚年的日记最完整，为什么只编到1972年底？这次准备再版时，主编也希望我有所增加。其实我一直在考虑，是否到了公开这20年间的日记的时候，结果觉得还是早了些。先师的日记虽然一般只记日程和事实，也免不了流露褒贬爱憎，涉及的人大多在世，提及的事或迄今尚无定论，如一字不删会引起公私尴尬，删多了又失去真实，也违背先师遗愿。与其如此，还不如再等若干年。

我在撰写先师传记时确定了一个原则——对在“文革”期间及以往运动中批斗迫害先师和他人者，一般都隐去其姓名，在选编《日记》时也如此处理。现在其中有些人已经去世，是否要将他们的姓名“揭秘”呢？我认为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先师生前对他们的行为一直持宽容态度，他说：“‘文化大革命’的账不能算在他们头上，他们不批斗我，也会有其他人来批斗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非公共人物，其影响仅限于本身的工作与生活圈。对于与他们有直接或间接的交往、有亲身经历的人来说，都保留着应有的记忆，提不提他们的名字完全一样。如果是为了研究这段历史，至多是需要他们这样的个案，没有真名实姓毫无影响。

而且，他们也是历史的产物，或者是这段历史的牺牲品，对他们不仅需要宽

容，更需要理解和同情。在先师身边有过一位对他一度颇有影响的人，他出生于1935年，当过工人，以后上大学，加入中共，本科未毕业就提前确定留校工作，被党委列为重点培养对象。“文革”开始紧跟党委，对先师之类“反动学术权威”的批斗不遗余力，据多人揭发他曾殴打先师。以后为“军宣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革委会”（校、系革命委员会）所信用，掌控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和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实权，80年代初还是研究室的实际负责人。改革开放后，党委拟吸收先师入党，他一再抵制；先师撰文纠正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中的历史地理谬误，他认为是政治立场问题；到1985年底还向党委反映本所存在的“路线错误”，要求当所长的先师作检查，并提出要整顿领导班子。以后他不听先师的规劝，执意调往他毫无经验和优势可言的留学生部，铩羽而归，转入历史系。那场“风波”后，他不公开地退了组织，以副教授职称退休不久身患绝症，弥留之际听从家人劝说皈依基督教。当时我已担任所长，为使他的讣告能在学校大门口张贴（一般限于教授），特意给校方打了报告，说明他对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曾有重大贡献。幸而那时的校领导已不知道他退出组织的往事，随即照准。

有如此经历的人绝非个别，只是具体情况不同而已。如实记录他们的事实有利于后人了解这一时代的历史，至于他们姓甚名谁，知道了又有什么意义？

为便于读者对先师的生平有所了解，这次增加了我的旧作《谭其骧年谱》。

葛剑雄

于壬辰中秋

目 录

- 1 前 言 (葛剑雄)
- 1 再版前言 (葛剑雄)
- 1 土改日记
(1951年10月27日—1952年2月5日)
- 16 京华日记
(1955年2月11日—1956年8月22日，
1956年10月12日—1957年1月13日)
- 70 “文革”日记
(1966年5月6日—1972年12月31日)
- 199 虔诚的忏悔
——思想改造手记
- 252 谭其骧年谱 (葛剑雄 撰)



(1951年10月27日—1952年2月5日)

1951年

10月27日 晨未明即起，整理行装，早餐，购备午餐。旋集合，久候车来。即归宿舍。送行李上船，全队十一组，连队部共十二船。船停宿舍旁，五河口也。水浅不能负重，每船留一二人于船上，余至队部集合，队长训话。步行三里许，至城西窑湾候船，新浚、旧浚交汇处也。新浚去年新开宽开深，旧浚仅宽丈许，深不及一尺，而船经旧浚溯上，久候不至。遥望船相去不及里许，一部分人迎上拉纤，或下水推船。下午四五点，大部分船到湾（第十组船晚九时始过湾）。五时左右自湾西上，岸上人赖小船驳至船上，杂乱无章。既上溯，风顺，船驶颇速。河曲极宽，似湖，但中泓亦极浅，篙下处泥浆随之而上。八时左右，船迷失方向，因船家未走过此路，彷徨失措，不得已靠岸询问。应靠北岸，竟靠南岸，船上人并南北亦不辨，可怪。靠岸处为杨集乡，随折而北行，衣单，冷极，而舱中只能睡五人，二十人皆在舱面。原料下午可到，只备午餐一顿，至是皆饥，饥寒交迫，较之自临淮至五河一夜更苦。午夜一时抵欧渡，行李用牛车，人步行三里，过胡台，至乔集。集南北一街，百四十户，除集北一庙现改学校外，无砖房瓦屋，泥墙草顶，贫富皆然。投乡公所少憩，旋宿张荣贵家，进稀饭，睡时已三点多矣。十五人宿小屋两间，地上有草，乡公所所备。他组或宿学校，或宿民居。

10月28日 七时许起身，队部今早到，厚宣 [胡厚宣，1911—1995年，时任复旦

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访。今日逢集（十天四集：一、三、六、八），有鱼虾、豆腐，无肉，无青菜，略有杂货，日中而散。有油条，无豆浆、烧饼。第十组九时始到，各组陆续起程。约十时开乡党委会，一时始散。饭后继开，会后各同志下村，留者陶组长、戴习生及余三人。据张伯荣言，张荣贵之子曾当甲长，决意迁去，晚饭起寄膳张荣恩家，饭后迁至张斌家。开本村党员小组会，深夜始罢。张斌之父前年死，母携之以去秋逃荒，未归，屋空。田七亩，现归乡长种。昨晚宿荣贵家系新草屋，甚洁；今晚之屋，满屋烟尘，普遍情形也，因居民做饭皆用灶，无烟突，地少木植，一切用具皆以土代之，或用芦苇，床则木架之中缠草绳而已。堂屋长案亦用土，亦用土床，砖则晒而未烧。

10月29日 晨，天未大明，陶即起（陶与余同居）。稍迟余亦起，与张斌之叔吃瓜。早餐后来访者四五人，进行调查。余倦极，进屋小睡，日中始起。下午各村同志来，旋开乡党员大会。两日来接触二三十人，了解各方情况，苦未能详细记下。乔集于全乡为最瘠，居民每值水灾，十之八皆逃荒，故全村鲜有未尝至南方者。居民以五谷为粮，为佐膳。往年至是时已逃荒，今年夏收尚佳，秋收仅半，目前麦种未半，而天旱不能下种，间有缺麦种者，估计全村粮食只能维持至明春。晚开村干部会，了解情况。

10月30日 上午各村同志来，召开工作队会。下午村北学校后殿（原为玉皇阁）开全乡村组干部会，陶推余作报告，说明来意，表明态度，解释土改之正义性，必需性，总路线，总政策，并与治淮、贷粮、种麦菜结合。晚开村民大会（街上），黑暗中作土改政策宣传，亦与治淮等问题结合，打通群众思想，解除顾虑。

10月31日 上午走访苦主陈大宽，大宽兄弟已下湖（当地人称下田曰下湖），稍候得晤，略事闲谈，又下湖，未得材料。至隔壁陈大本家谈少刻。下午开贫雇农（即无地少地）农民会，进行阶级教育，引苦诉苦。初步审查农会会员，被提指为富农、狗腿子、二流子、顽干者甚多。下午村干部会将结束时，李铁民[1906—1970年，时任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余开祥[时在复旦大学经济系任教，现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大杰[1904—1977年，时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及同学数人到乡。当晚去车集队部，车集离此十一里。沪寓交李铁民带来猪油一瓶、鱼肝油一瓶、痲子粉一盒。与开祥谈民众对治淮顾虑，种麦困难，贷粮困难。晚再开贫雇农诉苦会，深夜始归，上床时离天明迨已不久。陶与余皆无表。晚移至乡妇会主任詹杰家寄膳，两菜皆辣，吃白饭。连日早、晚餐皆高粱稀饭夹白薯，外有麦饼，中午吃米饭或加绿豆。

11月1日 下午在寓接见雇贫农，听诉苦。晚到街上群众会上作发动翌日农

会会员大会报告，说明农会意义，扩大审查办法。回寓又与苦主漫谈，深夜始息。连日寓中座上客常满，应接不暇，绝无丝毫余暇。

11月2日 原定上午开农会扩大会议，并审核原有会员，区蔡政委来，党团员开会，余不参加，因得发致曾世英〔时任新华地图社总编〕一函。上午各村党团员来，下午其他工作同志亦来开会，乡工作队与村干联合会议，交流经验。晚党团员去学校开会，余一人在寓，找二流子周佩经来谈，劝其明早出席农会表示悔改，因群众对其颇不满也。周表示能办到。连日工作困难，群众对地主仇恨心不高，而对顽干、二流子反痛恨，贫雇中农间闹小纠纷，诉苦对象多非地主。约十二时执笔记此，较之前数日提早甚多。

11月3日 上午各村同志及乡干部来，开会检讨工作队与乡干部矛盾问题，主要为张月秋、陈慎同所干之罗庄村村长、副村长成分不纯，有破坏嫌疑，隐匿情况，而樊指导员有包庇情况，审辩多时，未能解决。继又检讨薛因时工作不负责，一推一动，发言者五六人。下午开村农会扩大整顿会，原有百三十余人，上项贫雇农被提意见者三十一人，此项有部分表示悔过，结果仍有未通过者，主要对周佩经，因有勾匪抢全街牲口之说。新加入者五十余人，离全人口（650余人）45%标准尚远。晚与村农会主任沈学全整理农会会籍。今下午陶组长迁出，戴习生迁来对屋，乡、村工作分开，庶可彼此不影响。

11月4日 上午在寓写总结，未竟。下午召开党团员干部会，酝酿本村农代名单，得22人。晚召开各行政小组会议，分组推选代表候选人。余出席第四组，陶出席二组，戴出席一组，三组即交村干。同时在会上发展会员，我组得三十余人，合他组得七十余人，连原有共二百二十三人。二三四组代表依下午所拟推出，一组未能掌握，选出者半数伏出原名单之外，多不妥当。下午接吴应寿〔原浙江大学史地系学生，时为北京大学研究生〕函，渠两月生活费一百七十万元，家中仅转寄六十万元。夜失眠。

11月5日 上午原约定村干再研究代表候选人名单，未起床，陶来商议，决改开贫雇农会，避免走干部路线。早饭后通知，多数已下湖，到会者二十余人。将昨日名单重加审核，取消六人，补推五人。有陈大才者，抗战时八路村长，蒋军来后被捕毒打，能诉苦，群众举为候选人，而会后陶坚决反对，以其曾办理自首。但究竟办过自首与否，所传不一，尚属问题，但群众以为此乃保全性命不得已而为者，可原谅，余亦以为农村代表，不必以共产党员标准相衡，而陶坚持以为不可。余意群众提出，岂可由工作队擅行撤销，颇觉为难。下午召开农会会员大会，到者仅百余人，先通过新会员，妇女人会者多新取大名，唱名时群众皆不知系何人，一律通过。最后周佩经等人又起纠纷，在陶示意下通过。然后提出代

表候选人名单，先期已布置干部，将原定落选六人提出异议，未付表决径行撤销，又将补提五人提出，无异议通过。如何使民主能集中，思过半矣。场上秩序乱极，或笑或谈，小儿掺杂期间，鸡鸭游行会场，当主席对一意见提付表决时，请同意者举手，寥寥一二人；请不同意者举手，仍止一二人；非重复举行表决数次无法得结果，而群众举手与否又以陶之意见为转移。晚召开代表大会，填写名单，报告明天准备工作，布置每一代表负责十个会员，宣传政策，搜集材料。

11月6日 上午代表来汇报情况，下午各村同志、代表来乡，锣鼓、爆竹欢迎。晚开工作队、乡干会议，研究代表会开法，对工作队调配事纷议不决。回寓写标语。

11月7日 上午开代表会，陶惠报告光荣伟大的土改任务，余在寓写总结，匆匆未尽当言，对乡村干贪污只得暂搁不报。下午出席代表会，先由樊松报告，继以诉苦，武圩阡湾代表诉苦，至呜咽落泪，全场肃然，颇有陪哭者。五时许散会。晚分村开代表会，讨论苦根所在及总政策、总路线。

11月8日 上午开代表会，王祖一报告土改政策，余报告八大纪律，会后分村讨论。午后继续，旋再开大会，余连城作总结，王祖一布置工作，散会。各村代表回村，工作队留乡。晚开工作队会议，商调配事，仍不决。逾十点，陶组长自区回乡（先一日下午去区开会），又聚谈多时。晚饭后在工作队会议前出席分组传达会，谈土改政策。上午报告八大纪律后，李铁民、余开祥自区过乡回县，晤谈片刻。自六日晚起祝启秀、钱让同寓。

11月9日 上午开工作队会议，组长决定薛因时调丁湖，钱让调乡（昨决议姚谓玉调乡，钱调丁湖），又谈今后要求，布置工作，检讨代表大会优缺点。下午欲召开贫雇中农会，以前日下雨，农民方忙于种麦未果。午睡片刻，起床整理周佩经、罗洪来及地富材料，整理房屋。陶又迁来，与余及钱三人寓东屋，西屋作乡办公室，中屋作村办公室。晚先召开代表会，布置分别召开妇女、青年、贫雇中农大会，拟出青妇代表。旋出席贫雇中农会，传达大会精神。

11月10日 上午召开代表会，了解地主及反革命情况。下午整理材料，青代、妇代同时开会，余未出席。晚再开代表会，了解地反情况。

11月11日 填写地主罪恶性及破坏土改表。傍晚村南散步。晚召开农会，审核代表。回寓写第一阶段总结，未竟。代表五六人来谈，反映情况，补充材料。

11月12日 上午写总结。下午召集地主训话，写总结竟。傍晚与钱让去胡台。刘、祝二同志寄寓该村妇会主任朱玉亭家，草屋新盖，颇洁净。屋前有台地，面临浚河，眺望甚佳。值刘同志购有鲜鱼四尾，被留在屋前，月光下进晚餐，为下乡以后第一乐集。饭后急回集，召开村干代表会，讲阶级，未竟。

11月13日 上午整理材料。下午出席工作队会议。身体疲乏，而工作头绪纷繁，上级催索表格报告等不胜枚举，工作信心为之动摇。晚召开代表会，选举农会正副主任，交代写控告书，调查富裕中农以上任务。得家信。

11月14日 上午、下午代写控告书。晚写控告书，整理材料。

11月15日 开二次代表会（农会会员会）。上午王祖一致开幕辞，余连城讲阶级。前一日陶惠已去区也。午后分村讨论，提出本村地主，与前两次有异辞，当系一部分人存心包庇。正讨论间，周予同〔1898—1981年，时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复旦大学土改工作队大队长〕、陈子展〔1989—1990年，时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秉南〔蒋天枢，时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鲍正鹄〔中文系教师〕等自县来，讨论后继开会，选乡农协筹委。会场秩序甚坏，非代表亦参加。樊松指使张秀华提出丁明英为主委，秀华非代表，明英非筹委，竟通过。提及以乡斗名单，乔集提王兴国、张学周而不喊杀，会后樊、张认为乔集教育干代不够，实则王、张之罪，本不至死。会后进晚餐，餐后往周、陈寓所谈五分钟、即回寓开村干检讨会。乡、村干对余提意见，以为办事不应避之，实则因其包庇嫌疑也。继研究划分地主成分，反反复复，包庇显然。

11月16日 上午开村干代表会，研究地主材料，填富裕中农以上表，收获极少。下午继续，仍不解决。一由1944年—1946年为远，记不清，二由各有私心也。晚召开贫雇中农会，讲阶级，交各组讨论本村地富，即出席工作队会议。杜、段二同志来，通过一留乡，一归本村。

11月17日 上午整理地富材料，尚差得远。下午乡召开斗争大会，斗丁湖田俊章，有人命六条，天黑始散。晚出席工作队会议，十一时始散。回寓又与陶研究口口，准备明日村斗，至深夜三四点。

11月18日 上午开贫雇农干代会，准备下午斗争。下午开阶级斗争大会，先斗胡学恕，次斗张华宗，地契未肯交出。晚又开贫雇中农干代会，进行教育。会后陶开贫雇农会，余与段回寓开干代会总结，夜一点睡。

11月19日 上午再开斗争准备会，整理材料，下午出席乡斗争大会，斗贾贯芝。晚再开村斗会，先斗张华宗，结果斗倒，地契交出。次斗张允久、张华新二人。回寓准备明日工作，夜一时入睡。以致〔吴〕应寿信，应寿来函已十七日接到。

11月20日 上午斗王振国、王安国、张学申三人。学申父为恶霸，管公堂，去年已死。学申好人，现家中仅有薄田十四亩，内四亩水浇，生活不及贫雇农，斗争中群众皆发笑，余亦为之莞尔。下午斗罗太来、张学连及王兴国之妻。晚分组划分内部成分。

11月21日 上午整理富裕中农以上成分表，仍有材料不具体处。下午借钱让、戴习生等去区开会，抵刘集，天已傍晚，即去大车晚餐。天已黑，在队部前有粥一缸，无碗筷，用漱口杯盛粥，昏黑中立饮，衣襟尽粥。后借得一副筷，领得萝卜少许。饭后归刘集，半途而雨。本乡工作队代表共四十余人，寓所不及三方丈，无法展卧，出找展卧处，地已湿，脚穿布鞋，狼狈甚。旋觅得一屋，颇宽，本组五人与茂国乡五六人寓焉，用高粱秆席地，上铺被单而睡。夜雪，冷极，以带来仅薄被一条也。

11月22日 晨起漫天大雪，满路泥泞，无法出门，幸开会即择定此地。无水洗脸，亦无法去车家早餐。旋开会划分阶级，乔集、茂国两乡工作队代表数十人，会同批准两乡阶级成分，蔡政委出席。约十时，休会，至对门茶食铺，进茶食二千元作早餐，无开水。仅穿行一路，而脚已尽湿。旋又开会，余冷极，心不在焉。下午二时又休会，进午餐，在对门买得饼一张，芋头一碗，又本村代表所煮面条一碗。继续开会，至晚七时闭会。下午段遂鑫差人自村送来胶鞋雨衣，如得至宝。闭会后出门，至近处百姓家觅得面饼一块，水一碗作晚餐。夜睡原处，找得绳床一，睡得较上夜为暖。

11月23日 晨起打被包，至对门索芋头粥两碗。即与钱让偕同踏雪回村。雪已止，路上冻结，尚好走。至乔集附近已融化，入村则泥泞不能举足矣。两日未洗脸，未正式吃饭，又睡得冷，参加工作以来第一苦事也。急至寄膳处洗脸，买得公鸡一只，嘱白烧。回寓休息。午餐有鸡，又沽酒半斤，饱餐一顿，痛快有逾吃酒席矣。饭后即午睡，气候奇寒，未能熟睡。起身后绕室而转，来能工作。晚饭后找代表来寓研究未决成分。计算全村各阶层户口土地。补记二十日以来日记。十一时半入睡。

11月24日 整日开工作队会议，布置第三阶段工作。晚工作队、各村农会主任商讨调剂土地事，本村缺地，由胡台调剂。会议决定本村每人摊3.5亩。按本村地有以灵璧弓计者（每弓5尺2寸，每亩合五河1.2），有以五河弓计者（每弓4.8），没收、征收地中以五河亩者多，以每人3.8计，则吃亏。（各村以灵璧弓计者每人3.8，以五河弓计者4.5），余提出抗议，主席王祖一竟置之不理。颇愤急，此小子专断专行，最为可憎。

11月25日 上午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下午分村讨论，打通分配思想。上午大会上陶惠公开指责戴习生“本位”主义，态度甚坏。戴当时提出请指名，未应。饭后先开工作队会议，余即指责昨晚之事。最后决定胡台调剂乔集100亩（核计本应为90亩）。旋出席分村讨论会，代表皆表示不满。会后又开大会。晚先出席调剂会议，旋召开贫雇农中农会，传达讨论没收、征收方案，选出管制委员会抽